

田澍／著

正德十六年

——“大礼议”与嘉隆万改革

 人民出版社

正德十六年

——“大礼议”与嘉隆万改革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邵永忠
封面设计:石笑梦
封面题字:田应龙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正德十六年——“大礼议”与嘉隆万改革/田澍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01-012684-5

I. ①正… II. ①田… III. ①政治制度-研究-中国-明代 IV. ①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8035 号

正德十六年

ZHENGDE SHILIU NIAN

——“大礼议”与嘉隆万改革

田 澍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8.25

字数:300 千字

ISBN 978-7-01-012684-5 定价:3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自序

正德十六年（1521年）是永乐以后明代历史上最不平凡的一年。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在明代历史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其中“靖难之役”、“大礼议”无疑是两件影响最大的事件。所以要谈永乐以后的明朝之事，正德十六年“大礼议”是首要考察的问题。

我对明史的研究，起于对明代内阁的关注。1986—1989年在西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于1987年在黑龙江大学召开的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聆听了黄仁宇先生的精彩演讲，对我影响很大。黄先生观察问题的视角和充满激情且理性的发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第一篇发表的学术论文是1989年与硕士生导师郭厚安先生合作、刊登于甘肃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社会科学》杂志上的《对张居正权力之剖析》，独立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1990年在《北方论丛》上的《明代内阁新论》，是硕士论文的浓缩。这两篇论文的发表对我的明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决定着其后学术发展的路径。

1993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之后，在选定博士论文题目时，导师蔡美彪先生认为晚明社会研究薄弱，可有所作为。但由于自己当时对晚明历史不甚熟悉，故向蔡先生提出研究张居正，认为张居正研究还需亟待加强，有许多问题值得重新思考和进一步深化。先生听后表示同意，但他提出研究张居正必须先要认真研究嘉靖朝历史，如此，才能以更宽阔的视野来审视万历首辅张居正。当时对蔡先生的这一提示还不甚理解，便带着疑虑之心转移重点，开始真正用心研读嘉靖朝文献。

长期以来，学界对嘉靖朝的评价不高，大多以否定为基调。作为年轻学

者，也深受他人论著的影响，对嘉靖朝没有好感。在许多问题上人云亦云，以讹传讹。但在潜心阅读相关资料时，深深感到“大礼议”对嘉靖朝历史的巨大影响，认为它是认知嘉靖历史的最佳切入点。这样对“大礼议”的关注成为我研究的重点，也成为自己撬开嘉靖历史大门的一个支点。

传统的观点认为，以非常方式即位的明世宗应该感激杨廷和等老臣，嘉靖政治应该由杨廷和等人来控制，所谓“嘉靖新政”也只有由杨廷和等人来推行。世宗因“大礼议”而排斥杨廷和等老臣是嘉靖政治的不幸。在这种理念支配下，相当一部分学者对嘉靖政治予以悲观的评价，“腐败”、“黑暗”、“混斗”成了这一时期的代名词。但随着明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嘉靖政治全盘否定的学风被一部分学者所摒弃，他们开始从诸多方面对嘉靖历史予以重新反思，形成了一股嘉靖历史研究的潮流。因为不认真反思嘉靖历史阶段，就难以客观地认知嘉靖至明末特别是隆庆和万历时期的历史特点。

尽管世宗是以特殊方式继承皇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明代的皇权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武宗的猝死的确给当时的臣民带来了极大的恐慌，但这不足以说明当时的政局已经失控。朱元璋与朱棣建立的高度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这一非常时期仍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任何势力都不可能单独擅权，太后不得干政，宦官与阁臣相互制约，阁臣与九卿百官缺乏隶属关系，凡此等等，确保了皇权运行时的稳当非凡，不论皇位是否空缺，不论皇帝是否理政，这一格局都无法改变。这应是认识明代历史特别是正德、嘉靖之际历史演变的一个基本框架。无视这一宏观背景，对个别事件一味放大，任情发挥，难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大礼议”最后以世宗和张璁等人的胜利而告结束。就世宗最后取胜而杨廷和最终失败的原因需要认真探讨，并予以严肃对待。有些人认为“大礼议”中世宗的胜利是专制皇权高压或皇权强暴的结果，此论失之偏颇。在明代，并不是所有皇帝个人的意愿最后都能实现，被否决的案例俯拾皆是。对世宗能在“大礼议”中取胜的原因，仅用皇权因素解释是片面的。“大礼议”绝不是简单的礼仪之争，而是一次政治斗争，它是武宗生前拒绝立嗣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也是武宗生前不按礼法办事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完全无视武宗与“大礼议”的关系和武宗遗诏的相关规定，而以所谓亘古不变的僵化礼仪观来大谈世宗所面临的具体而又特殊的“大礼”并深陷其中的学风

必须予以改变。否则，武宗生前群臣极力要求他从同宗中选立皇嗣的种种言行就变得毫无意义了，他们的诸多担心也就是杞人忧天了。指望杨廷和等人不费吹灰之力而轻易地弥补武宗的种种失误，迫使世宗乖乖就范，显然是想当然的一厢情愿。事实上，“大礼议”所具有的确立世宗权威和组建新的人事结构的政治功能是其鲜明的特征。通过“大礼议”，世宗获得了双赢的结果：一方面他取得了议礼的胜利，这是为其尊严而战；另一方面组建了自己能够控制的人事格局，这是为其皇权而争。杨廷和集团是武宗猝死后皇位空缺时期所形成的一个特殊势力，他们试图借助“大礼议”向世宗的皇权挑战。而世宗为了维护皇权，必须借助“大礼议”将其清除。不论人们对杨廷和集团是同情，还是崇敬，但绝不能无视此时日臻完善和日益巩固的皇权体制。换言之，明代皇权在这一时期并未衰落，朝臣不具备单独向皇权挑战的时机和能量。无视这一基本前提，一味地凸现他们的德行和事功是本末倒置，无助于对这一时期历史的客观认知。在当时的体制下，在没有必然把握取胜的前提下，杨廷和要把自己漏洞百出的大礼观强加于世宗头上，本身就是一步险棋。一旦付诸实际，将不可收拾，必须为此付出代价。而与皇帝形同水火的对抗，已经将其送上绝路。杨廷和等人缺乏基本的政治风险控制能力，离开嘉靖政坛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尽管有人因此而极其厌恶世宗的皇权而予以严词声讨，但对现实的政治却无可奈何，人们只有通过放大杨廷和在这一短时期的所谓“功绩”和突出世宗对杨廷和集团的镇压而慰藉心灵（同情杨廷和者，对杨廷和排斥乃至暗杀张璁等人的行为视而不见，再三回避，是明史研究中的一大怪现象）。在明代皇权体制下，如果杨廷和集团强迫世宗接受其大礼观，那才是明代历史的一大变态。

钦定大礼之后，世宗重用张璁等“大礼新贵”是嘉靖至万历前期政治变革的真正开端。在杨廷和等人依照惯例草拟的世宗即位诏书中提出了“兹欲兴道致治，必当革故鼎新”的主张，并在世宗即位后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针对武宗败政的除弊活动，这是明代皇位更迭时的惯例和常态，而非真正的革新活动。大礼之争使杨廷和与世宗的关系难以调和，得不到皇帝的全力支持，杨廷和等人也就不可能从事所谓的“革故鼎新”了。要杨廷和在与世宗皇帝的对抗中推行变革，那只不过是痴人梦呓罢了。

杨廷和最大的政治功劳就是在武宗猝死后，按照明朝的基本制度协调各

方势力，迅速选定新帝并确保其顺利登基，而不是依照惯例在新帝即位之初的所谓“革新”。不论在武宗时期，还是世宗时期，杨廷和都无法与皇帝建立互信关系，故他不可能有效地对明朝政治产生积极影响。

嘉靖三年（1524年）钦定大礼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以下积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一是树立了世宗的独立、自尊和自信意识，使其能将注意力转移到革新活动方面；二是击碎了杨廷和集团，清除了前朝弊政得以延续的传统势力，标志着杨廷和时代的结束，为重建嘉靖政治新秩序奠定了良好基础；三是树立了世宗的皇帝权威，组建了君臣互信的新的的人事格局，使革新具有可靠的组织保障。

中国古代社会的改革不是彻底颠覆的代名词，更不是革命，而是在各该王朝根本体制框架内最大限度的自上而下的自我更新，即在继承中相对务实的部分批判、部分否定和部分创新。当然，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而是时时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但对这一变化不能随便冠以“改革”之名。就明朝而言，明代历史在洪武、永乐体制的构架中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同一皇帝在其前后期的施政有所不同，不同皇帝自然也有施政理念的差别，但由于父死子继基本模式的保障，新旧皇帝之间的政治断裂度不太明显，故不能将这些现象不加分析地称之为“改革”。那么，如何确定明朝的改革期呢？毋庸置疑，要进行改革，就必须首先形成改革的条件，但这个条件不是在平和的环境中一夜之间形成的，而是在激烈的甚至是惊心动魄的内部斗争中形成的。就明代改革而言，应在洪武、永乐之后的明代历史长河中断裂度相对大的时段观察从事改革的条件。相对于父死子继的即位模式，兄终弟及模式与前朝的断裂度相对要大一些。在这一时期内，先后出现了三次兄终弟及的即位模式，即朱祁钰（代宗）之于朱祁镇、朱厚熜（世宗）之于朱厚照（武宗）和朱由检（思宗）之于朱由校（熹宗）。在以上三个事例中，朱祁钰与朱祁镇、朱由检与朱由校皆为同父兄弟，又与朱厚熜与朱厚照同堂兄弟不同。很明显，后者的断裂度更大，更具改革的可能性。

但要把改革的可能性转化成现实性，仅仅是正常的“兄终弟及”也是难以完成的。因为改革的前提之一是对前朝乃至前几朝行政的批判与反思，甚至是部分的否定。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经历一次痛苦的政治撕裂和较为彻底的人事变动。换言之，改革与人事变动具有密切的关系，没有较为彻

底的人事变动，就不可能在王朝体制之内进行有效的改革。所以仅仅是皇帝的变更还不足以形成改革的充分条件，同时还必须形成与皇帝变更相适应的新兴力量。当然，这种相互匹配的改革条件绝不是某一个或某一种势力的人为导演所能实现的，而是要经过特殊事件的洗礼才能具备。明朝在正德十六年因明武宗的暴亡而带来了改革最佳条件的出现。

武宗死后的政治震荡集中反映在“大礼议”之中。前已述及，“大礼议”的核心是明世宗朱厚熜能否改换父母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世宗不能改换父母，世宗与孝宗是伯侄关系，与武宗是堂兄弟关系，标志着孝宗—武宗帝系的彻底断裂。随着这一问题的解决，承载前朝乃至前几朝弊政的杨廷和及其追随者被世宗彻底清除，而与前朝弊政无甚瓜葛的张璁、桂萼等中下层官员迅速崛起，在短时期内取代了杨廷和集团，组建了新君新臣全新的人事格局。世宗对张璁说：“君臣之际，固不可不严，此在朝之当慎，他处则犹家礼然。汉文帝之召见贾生，因语久而为之前席，今亦称美。故君臣不交，治功安成？卿夙夜在公，敬君尽礼，昨见退逊太过，恐非辅臣之于君者。夫何谓辅导大臣？与他臣不同，故曰‘导之训教，辅以德义，保其身体’。此则不可在朝之制相与明矣。今后凡会议，或卿有所入奏，无拘时而来，面相计处，庶裨交修。俟朕性志有定，方可广接他人，庶有所酌别贤否耳。”^①正德、嘉靖之际人事更迭的彻底性和全新的人事组合是明成祖之后明代历史上独有的现象。所以说，大礼议是明代改革的起点，世宗借助大礼议清除了孝武时期的遗老遗少，培植了新兴势力，完全改变了皇位更迭之际旧臣退出政坛的模式。换言之，杨廷和集团在大礼议中彻底翻船，不可能再掀风浪，更不可能东山再起。明世宗通过大礼议彻底粉碎杨廷和集团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统治阶级内部成功清除旧势力的一次典型案例。这是一个奇迹，自然孕育着新的政治气象，必然伴随着政治变革。

大礼议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没有大礼议，就不会形成从事变革的条件。不可否认，大礼议大大伤害了世宗与武宗之间的感情，也因此拉大了世宗与武宗乃至孝宗朝政治的距离，这就为嘉靖朝的政治变革创造了客观的、难得的改革机遇，使改革由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这是认识明代改革必须正

^① 《典故纪闻》卷17。

视的关键节点，也是认识张居正行为的基点。

就永乐以后的明代历史而言，大礼议无疑是一场政坛巨变。不论人们对议礼双方持何种态度，有一点是要必须承认的，那就是杨廷和集团的彻底崩溃和张璁等新兴势力的迅速崛起。而这样一次重大的人事更迭必须伴随着一场重大的政治改革。孝—武帝系的彻底断绝所引发的不仅仅是庙制等纯礼仪的变革，而是全面的政治革新。也就是说，世宗在全力进行礼制创新的同时，也会积极推行重大的政治变革。只强调前者，而无视后者，显然是偏颇的。世宗把变革的矛头直接指向杨廷和集团，尽一切可能清除杨廷和集团是嘉靖革新的核心内容之一。由于大礼议最终按照武宗遗诏的明确规定承认了世宗与兴献王的父子关系，成为不可更改的基本原则，决定着此后明代历史的走向。

对于世宗来说，从事变革的动力来自于他与张璁等人的自信。武宗去世后，政坛自然是由其培植的势力控制，杨廷和自然是武宗势力的代言人。从湖北安陆成长起来的、年仅十四岁的朱厚熜单枪匹马地前往京城继位，无疑势单力薄，弄不好便成为杨廷和集团的傀儡。杨廷和集团在大礼议中的狂妄和嚣张也充分说明了他们根本不把嘉靖皇帝放在眼中。他们在大礼议中公然违背武宗遗诏，强词夺理，非要强迫世宗改换父母，再次证明了他们对嘉靖皇帝的蔑视。换言之，大礼议就是杨廷和集团嘲弄世宗、蔑视世宗的集中反映。他们瞧不起嘉靖皇帝的出身，认为只有改换父母，才能由“小宗”变成“大宗”，抬高嘉靖皇帝的身份，取得合法的继承权。然而，少年朱厚熜以充分的自信拒绝改换自己的出身，他坚持自己只是兴献王朱祐杬的儿子和宪宗皇帝的孙子。在世宗看来，藩王朱祐杬的儿子也能当皇帝，明朝的皇位是祖宗的遗留下的皇位，而不是孝宗遗留下的皇位。换句话说，就是祖宗之天下，而非孝宗之天下。在大礼议中，给人耳目一新的就是世宗的自信和敏锐，他始终未上杨廷和的圈套，不被杨廷和所宣称的“纲常”所迷惑，更没有被吓倒，而是从事实出发，敢于创造历史，最后以独立的姿态君临天下。朱东润先生论道：在英宗、世宗、神宗、熹宗等年轻继位的明代皇帝中，“世宗最能干，即位不久，大权随即到手”。^① 嘉靖皇帝通过大礼议击碎

^① 朱东润：《张居正大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4页。

了强大的杨廷和集团，清除了施政的障碍，自然会以极大的自信从事变革。作为年少皇帝，世宗敢于担当的品格和不畏前朝旧势力的勇气是从事变革的根本保证。也就是说，嘉靖皇帝所表现出的自信、无畏与强势是改革必备的条件。

就张璁等人而言，其变革的动力来自于树立自我形象的需要。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有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人们反对论资排辈，主张用人不拘一格；另一方面又对新兴势力抱以怀疑，极尽诬蔑之能事。张璁在大礼议中不怕杨廷和集团的围攻和暗杀，挺身而出，打破一言堂，将大礼议引向正常的争论轨道，并主导着大礼议的发展方向，这没有无畏的勇气和超众的见识是不可能做到的。然而，在大礼议中，杨廷和集团像瞧不起世宗一样瞧不起张璁等人的身份，攻击张璁是为了自己的升迁而讨好、“迎合”世宗。为了回应这一恶意的诬蔑之词，在钦定大礼议之后，张璁等人便通过改革行为来回应杨廷和集团的攻击，以树立良好的形象。张璁等人在大礼议中经受住了杨廷和集团大肆攻击和报复的考验，这一特殊的经历练就了从事变革的品质。健康的改革不可能只靠皇帝，也不可能依靠张璁等几位朝臣，而是来自于君臣的合力，取决于可控的政局。世宗与张璁等人的合力构成了嘉靖革新的强大动力，世宗借助大礼议击败杨廷和集团而绝对掌控政局，这就意味着这场革新是健康的、持久的。换言之，嘉靖革新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在于推动这场革新的君臣皆来自于前朝政治势力之外，与前朝弊政没有多少瓜葛，也较少思想负担，有足够的勇气和锐气来担当革新重任。特别是大礼议公开了双方的矛盾，故世宗与张璁等人在推行变革新时不再遮遮掩掩。相反，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清除杨廷和集团，并通过整肃科举、倡行三途并用、整顿学政、力行官员的双向流动、整饬言路、清除翰林院积弊、裁革冗滥、革除镇守中官、限革庄田、推行一条鞭法等措施，最大限度地清理了明朝一百余年的积弊，开启了变革潮流。正是由于嘉靖前期形成了君臣变革的群体力量，故在命名明代变革时，不应采用个人命名法，而应采用年号命名法。尽管张璁等人先后退出嘉靖政坛，但因世宗仍在，故变革不会因张璁等人的退出戛然而止。特别是由于嘉靖皇帝是万历之前明朝在位最久的帝王，长达四十五年，所以革新活动一直能够延续，如一条鞭法仍在继续推行、宗室俸禄的裁革在嘉靖后期有新的举措，这是明朝不同于其他王朝变革的关键之处，也是

明代改革特点的集中体现。

以张璁为主线而不是以杨廷和为主线来研究嘉靖政治是自己不同于传统学风之所在。这一视角的改变会带来许多新的认识，完全可以纠正已有的错误观点。在大礼议中，杨廷和集团的惨败和张璁等人的崛起是特殊的人事更迭，实现了嘉靖朝政治利益的最大化，应予充分肯定。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探讨嘉靖政治的相关问题；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论永乐以后明代改革的问题。

长期以来，谈及明代改革，大部分人只谈所谓“张居正改革”，把明代改革仅仅理解成首辅张居正的十年改革。后来韦庆远先生打破了这一狭隘之论，提出了“隆万大改革”，并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这一观点彻底否定了用“张居正改革”代替明代改革的片面认识，是张居正研究的一大进步，也是明史研究的一大进步！但韦先生谈“隆万大改革”是在全面否定嘉靖政治的基础上进行的，在笔者看来，是不符合史实的。在韦先生生前，曾利用在湖南石门和南京等地召开的数次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之机，我和韦先生单独多次讨论这一问题。作为后学，我向韦先生阐明了自己的观点，韦先生表示理解和支持，并鼓励我坚持继续探索，完善观点。尽管我们学术观点不同，但韦先生是我非常敬仰的前辈学者。学术只有在平等条件下进行理性讨论才有意义，正确的就要坚持，错误的就要放弃，不明白的就要探究，有争议的就要交流。可惜的是，韦先生不久离开了我们，使明史学界失去了一位可敬的长者，使我失去了一位能够促膝交谈的师长！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首次提出并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嘉靖革新”，又提出了“嘉隆万改革”的观点。认为只有如此，才能比较清晰地认识张居正行政行为的特点。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明代改革的特征，解释明代政权延续长久的原因。因为任何一场真正的改革活动绝不是十年或几年的短期行为，也不是某一个人的自导自演。只有将明代改革看成六十年较长时段的政治活动，才能认识改革的复杂性和艰难性。在宪宗以后的明朝诸帝即位诏书中，穆宗即位诏书文字最少，罗列长达四十五年的嘉靖朝弊政款数也最少，这足以说明嘉靖革新的巨大效果。但对此奇特现象，学界无人关注，更无人能够给予合理解读。当然，这是一味地批评和丑化嘉靖政治的学者所无法回答的一个问题，更是他们不愿面对的一个问题。

在继续思考大礼议、嘉靖革新、嘉隆万改革等诸多问题的基础上，我将把主要精力转到对张居正相关问题的研究上，将张居正置于明史特别是嘉靖革新的大背景下予以全方位研究，以使对张居正的认识趋于客观，并总结出深刻的教训。学术研究贵在求实，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不是评价高不高的问题，而是实不实的问题。随着视角的转换，对张居正的评价肯定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不是为了贬低张居正，而是为了反映真实的张居正。很显然，在嘉靖革新视野下，必定打破对张居正一味美化的观念。而对张居正的研究，其目的不是为了美化或丑化，而是为了揭示历史的真实，总结历史经验。但目前对张居正的研究，既没有讲清他的政绩和行政特点，也没有探明他成败的真正原因，即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远远不够，还需下气力做深入研究。

大礼议深深影响着嘉靖以来明代历史的走向，只有以大礼议为主线充分肯定世宗和张璁等人的议礼行为，充分认识大礼议的积极意义，才能认清明代中后期历史的重大转型和发展路径，才能认清明代改革的特点。本书就大礼议对明代政治的重大影响以及与嘉隆万改革的密切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完全不同于传统认识的观点，旨在提供批评的靶子，引起学界对大礼议与嘉隆万政治的全新思考，推动明代中后期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作为一家之言，需要在争论中不断扬弃与完善，真心期待读者不吝赐教！

田 澍

2013年6月6日于兰州黄河之畔

目 录

自 序	(1)
总论 嘉隆万改革：明代改革新模式	(1)
一、嘉靖革新概念的解读	(2)
二、嘉隆万改革与明朝国运	(11)
第一章 武宗暴亡绝嗣：政局的巨变	(18)
一、明武宗拒绝立嗣	(19)
二、明武宗暴亡后江彬何以被捕	(27)
三、皇位空缺时期的政局特点	(35)
第二章 张璁：大礼议中的胜利者	(46)
一、张璁反对世宗改换父母	(47)
二、张璁议礼非“迎合”行为	(60)
三、张璁是嘉隆万改革的开启者	(70)
第三章 杨廷和：大礼议中的失败者	(79)
一、大礼议与杨廷和阁权的畸变	(80)
二、杨廷和在大礼议中的失败	(89)
三、杨廷和难以担当革新重任	(101)

第四章 大礼议：明代改革的序幕	(108)
一、正德、嘉靖政局的走向	(109)
二、嘉靖革新条件的生成	(118)
三、洪武祖制与嘉靖革新	(129)
第五章 嘉靖革新：明代改革的黄金期	(139)
一、裁革冗员	(140)
二、人事制度改革	(149)
三、监察制度改革	(159)
四、改革科举制度	(168)
五、革除镇守中官	(177)
六、内阁改革	(193)
七、哈密危机的解决	(213)
第六章 张居正：嘉靖革新的继承者	(228)
一、隆庆政治的走向	(229)
二、张居正对嘉靖革新的效法	(237)
三、张居正辅政时的弊政	(252)
四、张居正致怨与身后阁权的衰微	(259)
主要参考书目	(271)

总论 嘉隆万改革：明代改革新模式

明代历史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明太祖与明成祖的创制立法时期，即明人所谓“二祖之制”时期；二是明仁宗至明武宗的守成与腐败时期；三是嘉靖至万历初年的变革自救时期；四是张居正去世至崇祯自杀的失控衰败时期。对于第一、二、四个阶段的明史，学界没有太多的分歧。但对于第三阶段，学界的认识有明显的不同。其中传统的观点强调正德、嘉靖之际所谓杨廷和“新政”和万历前十年所谓“张居正改革”，而将近半个世纪的嘉靖时代描绘成腐败黑暗时期，过分抬高张居正担任首辅时的“改革”作用。然而，当我们认真研读嘉靖历史，摆脱传统羁绊时，就会发现充满活力的嘉靖时代。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嘉靖革新”的概念，对学界一味丑化嘉靖时代的风气提出了批评和否定，认为这是第三阶段的核心变革时期，即嘉靖时代是永乐以后明代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巨变时代。

众所周知，明朝是中国古代立国最久的封建王朝之一。朱元璋称帝后推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其针对的不仅是元朝的弊政，而且还有自秦以来的积弊。在此基础上，朱棣再行变革，完善了洪武体制，夯实了立国基础。我们讲明代改革，就是指永乐以后明代历史长河中的改革气象。这一改革条件只有从正德、嘉靖之际的政治裂变中来确定。这一改革时期持续六十年之久，笔者称之为“嘉隆万改革”。尽管这一改革时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是明代最具活力的时代，有效延续了明朝的统治命运。“嘉隆万改革”与洪武永乐改制构成了明朝独有的政治变革景象，成为

明朝鲜明的政治特点。对不同时代的政治要求而从事针对性变革是明朝立国久远的根本原因，也是解读明代政治走向的锁钥。

一、嘉靖革新概念的解读

嘉靖时期在明代历史上是一个特殊阶段，“嘉靖革新”是本人首先提出的一个概念，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现就嘉靖革新概念的提出、主要观点和革新作用诸问题作一简要的说明。

（一）“嘉靖革新”概念的提出

“嘉靖革新”概念的提出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反复研磨后得出的。在未认真接触这一问题之前，笔者深受传统观点的影响，对嘉靖政治没有好感，认为是腐败不堪，黑暗至极。1993年本人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后不久，导师蔡美彪先生要我自己初步选定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当我提出研究张居正时，先生认为此题可做，但若仅仅局限于万历初年的历史来研究张居正，很难取得学术上的突破。他结合自己撰写《中国通史》的深刻体会，认为要研究张居正及其政治行为，首先必须搞清嘉靖前期的历史特点，然后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得上对张居正变革的真正研究，避免张居正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就事论事、人云亦云的现象，改变张居正功大还是过大的研究模式。乍听此言，自己大惑不解，一时很难把嘉靖前期的历史与张居正变革联系起来予以考察。在先生的不断启迪下，我便怀着新奇之感和疑虑之心转移了注意力，潜心于嘉靖前期历史的重新认知，先后摘录了一百多万字的资料，逐渐地对嘉靖前期的历史有了新的看法。

在此之前，尽管学界还未明确提出“嘉靖革新”的概念，但一些学者已经开始摒弃传统之见，对世宗即位后的嘉靖政治予以重新探讨，得出了一些具有启迪意义的观点。其中作出开拓性贡献的要数李洵和罗辉映两位先生。他们都把重新评价“大礼议”作为认识嘉靖政治变化的切入点。1986年，李洵先生在《东北师大学报》第5期上发表了《“大礼议”与明代政治》一文。该文摆脱了传统史学对大礼议的狭隘看法，将其置于“明代社会问题和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政治史的总体背景”上来考察，得出了如下

观点：

1. 世宗即位诏书主要反映了张太后和杨廷和等人的政治观点，其目的是恢复正德以前的秩序。但是，由于未能得到世宗及其追随者的完全认可，故其大部分措施未能付诸实践。

2. 大礼议的发生具有深刻的政治原因。杨廷和的大礼论调不符合世宗入继的情况，其目的是要把世宗纳入孝宗以来的统系，以便使其能够继承孝宗的政策和执行孝宗的制度。这与世宗即位诏书的政治目的是完全一致的。而世宗的议礼主张却是为了获得政治独立自主的基础，故其既不想做武宗的嗣君，也不想做孝宗的嗣君。为了摆脱某些旧贵族和某些官僚势力的控制，世宗必须争取获得这种政治上的独立性。

3. 钦定大礼之后，世宗与张璁等新晋官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十六世纪以后明代政治中所出现的改革浪潮和各种改革派势力，则与嘉靖时的各种改革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而明代晚期的党争，除去派系权势之争外，核心问题是改革派与贵族大地主之间的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

罗辉映先生对大礼议的看法与李洵先生基本一致。他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明史研究论丛》第3辑上发表了《论明代“大礼议”》一文，论道：“杨廷和一派人可以而且应该修正其议礼的观点，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企图凭借权力，制服张、桂诸臣。杨廷和等不允许议礼这支政治力量崛起而损害本集团的利益。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无法避免，斗争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效果，礼法之争含容不了它的全部意义。”接着对张璁等人登上政治舞台之后所进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措施予以简要的论述，并给予极高的评价。同时指出，对杨廷和依据即位诏书而推行的所谓嘉靖“新政”不宜评价过高，因为世宗即位之后的政治局势并未取得根本好转，政治危机依旧十分严重。在《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2期上，他又发表了《杨廷和事略考实》一文，进一步论道：世宗即位之初的“政治局面徒有治名，完全是杨廷和一派人的自吹自擂。历史上所说的嘉靖中兴之治，乃是通过大礼议，摧毁了杨廷和腐朽官僚集团后，由张璁、桂萼为首的议礼诸臣肇创的嘉靖前期政治”。

在未认真研读正德、嘉靖之际的史料之前，以上观点并没有引起笔者的